

【唐宋文学】

精神实录与边塞想象： 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疏证

李俊

【摘要】《前出塞》和《后出塞》的创作时间旧注多有歧说,根据内容判断这两组诗当作于安禄山起兵到关中失陷之前,两组诗歌的创作时间相隔不远。突发的战事引起了杜甫对出塞、军事等问题的反省。杜甫放下士大夫的身份意识,自觉地站在从军者的立场上叙述出塞的经历,深入探寻出塞作战的心路历程,并对当时流行的建功受赏传统观念作了冷静的反思,对战争的真相做出了直接判断,这是杜甫对乐府诗歌艺术特色和社会功能的独特理解。旧注认为《前出塞》是为哥舒翰备吐蕃而发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果按照诗史互证的思路来推求,杜甫笔下的出塞指向是西州为中心的安西北庭区域。但是杜甫本人从未有过出塞西域的从军经历,友人岑参从军西域的经历及其所作诗歌,可能对他合理掌握写实与想象之间的艺术张力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实录;想象;西域;乐府

【作者简介】李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488)。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23.5.70~79,88

唐代的边塞诗人在数量上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群体,高适、岑参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边塞诗创作方面的成功,和他们从军赴边的特殊经历有密切关系。与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相比,杜甫的一生缺乏真正的边塞体验,对以北方、长城、大漠为主要背景的边塞前线缺乏直接的接触。换句话说,从杜甫一生的实际经历来看,他对边塞生活、军旅生涯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隔膜的。然而,他创作了《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对边塞问题的思考和对从军经历的想象。反映社会疾苦的乐府诗以写实为主,而杜甫书写出塞故事又必须加入必要的想象,写实和想象就在这两组诗歌的创作中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本文通过对两组诗歌内容的疏证,考察两组诗歌的创作时间,探讨写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其作为杜甫体认乐府诗歌艺术精神的重要环节阐述

其文学史意义。

一、《前出塞》和《后出塞》创作背景考释

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是两组作品,《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内容虽有差异,但性质和艺术风格是一致的。关于这两组作品的创作背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和争论。《杜诗详注》云:

《杜臆》:《前出塞》云赴交河,《后出塞》云赴蓟门,明是两路出兵。考唐之交河,在伊川西七百里。当是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诗亦当作于此时,非追作也。张缜注:单复编在开元二十八年,黄鹤以为乾元时思天宝间事而作。今依范编在天宝间。^①

《前出塞》写的出塞是指向西域的。杜甫有《兵车行》一诗,对天宝间募兵西征引起民愤民怨有深刻揭示。诗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

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把笔触直接伸向青海战争,而且明确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穷兵黩武行径表达了不满。这首诗歌是杜甫的代表作,形成了杜甫诗歌的强烈声调,表现了杜甫对天宝时期军事活动的基本态度。联系唐玄宗时期的西域战事,古代注家认为杜甫《前出塞》表现的出塞西域也与哥舒翰的战事有关。虽然这只是个联想,却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玄宗时期与吐蕃的军事摩擦和交战是长期持续的,只不过哥舒翰与吐蕃的战事是其中最著者而已。浦起龙云:“王嗣奭《杜臆》:‘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愚按:征西已久,不必泥定哥舒,与《兵车行》所指之事同。”^②可见,把《前出塞》九首与吐蕃战事联系起来理解,注家多认为可从。

《后出塞》所写的内容与安禄山有关,历来没有异说。但这组诗的创作时间则有两说:一说是安史之乱爆发前,一说是安史之乱爆发后。鲍钦止曰:“天宝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禄山及契丹战于潢水,败之,故有《后出塞》五首,为出兵赴渔阳也。”因安禄山与契丹在天宝十四载发生战事,便据此将这组诗歌系于本年,这个考据是十分疏阔的。安禄山与契丹常有战争,不可拘泥于天宝十四载。然而后来的注家,受鲍说影响,曲为解释,唐元竑、浦起龙、施鸿保都认为是安禄山起兵前的作品,这显然与第五首诗歌中的“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相抵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注者就说这两句乃是预见之词:“此乃公先见,假逃将口决其必叛,‘坐见’云者,犹扶眼吴门观越兵之入耳。此诗必作于天宝末年,禄山未叛时无疑。”^③这是臆说,杜甫虽然关心现实政治,忧患特深,但一定要说他在安禄山未起兵时就已预见其反叛,且能准确预言其长驱河洛,陷落东都,这是杜甫在当时无法做到的。这些注家因愤恨安禄山叛乱,进而讥讽玄宗养虎成患,而将老杜等人塑造为能洞察隐微、预言先知的高人,甚至说“少陵论事,其眼光皆透到百十年后”^④,都难以取信于人。如将“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看作当时实况,则此诗作于

安禄山反叛后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仇注将其系年于天宝十四年冬,而钱谦益、朱鹤龄系于西行秦州以后。

与系年时间相关,这两组诗是事发当时的纪实之作,还是事发已久的反思之作,历来也有不同意见。朱鹤龄云:“黄鹤注以前、后《出塞》俱公在秦州作,今从草堂本分编。”^⑤所谓《草堂本》即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将《前出塞》系于天宝中旅食京华时,将《后出塞》系于乾元时移居秦州前后。蔡梦弼《草堂本》“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岁月,以为定本”^⑥,则如此编年出于鲁豈。但是“黄鹤注以前、后《出塞》俱公在秦州作”的意见也有人继承,《钱注杜诗》即将《前出塞》《后出塞》皆编于秦州时期。“《前出塞》为征秦陇之兵赴交河而作。《后出塞》为征东都之兵赴蓟门而作也。前则主上好武,穷兵开边,故以从军苦乐之辞言之。后则禄山逆节既萌,幽燕骚动,而人主不悟,卒有陷没之祸,假征成者之辞以讥切之也。”^⑦卢元昌云:“乾元二年秦州诗。”“追讽玄宗宠任安禄山,是天宝间事。”^⑧谢思炜说:“诗中云‘中原有斗争’,显指安史之乱,黄鹤注依旧编不误。”^⑨这些注家可能在深入研读这组作品时,发现了一些反思性的内容,甚至看到有些诗句写到了中原正在发生的战争,这些蛛丝马迹和内在脉络似乎提示读者,《前出塞》的内容虽然有史实根据,但对史实的表现并非即时的,而是把天宝时期的西部战争,和后来爆发的中原叛乱等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段历史来深入思考的。安史之乱的爆发是玄宗乃至整个初、盛唐政治的重要节点,它是许多政治、军事和文化问题的历史性后果,对整个初、盛唐社会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切入点。因此,这些注家认为杜甫《前出塞》组诗作于叛乱发生之后,是对天宝战事严重政治后果的切实反省和检讨,这其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比将这组诗歌系于战事爆发之时更为耐人寻味。

同时,对系年问题的探索也涉及对这两组诗歌关系的认识。《后出塞》与《前出塞》相呼应,显然是有意而为的,故而诗题冠以“前”“后”字样。仇注云:

“当时初作九首，单名出塞，及后来再作五首，故加前后字以分别之。旧注见题中‘前’‘后’字，遂疑同时之作，误矣。”^⑩《前出塞》和《后出塞》的内容各有偏重，互相补充和照应，这两组作品虽然分别为“前”“后”，但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读。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前”和“后”的字样不是编辑学意义上的简单划分，而是对两组诗歌的整合，使之成为连贯的整体。这两组诗歌的创作可能有间隔，但是这个间隔到底如何，读者有不同的判断。如果将这两组诗歌看作是即时之作，作品所关涉的具体事件在时间上的定位就是决定性的，所以如仇注等将《前出塞》系于天宝中期，与哥舒翰备吐蕃紧密关联，而将《后出塞》系于至德、乾元之间，前后间隔将近十年。而如果将这两组诗歌看作“追讽”之作，作品所关涉的具体事件在时间上的定位就不再是决定性的了，因为问题不再是这些战事何时发生，而是这些战事何时被追忆和反思，所以可将其系于同一时间，“前”与“后”的间距可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钱注将两者皆编入秦州时期。可以说，前一种编排方式看到了内容上的侧重有所区别，后一种编排方式则看到了两组作品的连贯性。这两种编排方式之间的弹性，来自诗歌诠释的内在空间。

仇注对“前”“后”两字是从编辑学上解释的，但实际上，在杜甫诗集中，同题之作十分普遍，并非都要从编辑学上用“前”“后”或其他字样表示区别。如“望岳”就有三首，一首望东岳泰山，一首望西岳华山，一首望南岳衡山，前者作于漫游齐赵时期，次者作于华州时期，后者作于漂泊西南时期，洵是一“前”一“中”一“后”，但作者并未将其名为“前望岳”“中望岳”“后望岳”。另有“得舍弟消息”“漫兴”“遣兴”“野望”“雨”“月”“雷”“夜”“晚晴”等为题的作品屡见于集中，恐怕也无暇一一标明区别字样。而与《前出塞》《后出塞》相类，在诗题中标出“前”“后”的作品，有《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我们可以由此考察“前”“后”两组诗歌的关系。为什么老杜在大历二年同用“苦寒行”题目，写了“前”“后”两组作品？细看这两组“苦寒行”，其间关目很值得玩味。仇注：

“蔡氏编《后苦寒》在《晴》《阴》二诗之后，次第特清。”^⑪可知前后《苦寒行》和《晴》《阴》是一组诗，详细记载了当年夔州隆冬时节的极寒天气，以及作者的所思所忧。《前苦寒行二首》写峡中天气陡降，白雪填谷，实为异常。傍晚雪霁天晴，似有回阳之意，老杜故有《晚晴》之作。岂料次日阴云如晦，真可谓天意难测，老杜又作《复阴》。向晚狂风大作，中夜拔木，较前日之寒更甚，故老杜又作《后苦寒行二首》，从天气异常落笔，想到青海用兵、杀气南行云云。将这一组诗歌联系起来看，“苦寒”是诗人写作的由头，但“苦寒”在写作中的意义何在？老杜按照古代文化中的“纪异”传统，《前苦寒行二首》主要从自然描述落笔，暗含个人遭际的牢骚，似有未尽之意。《后苦寒行二首》则想到了国家政治层面，明确将风雪苦寒与吐蕃交战联系起来，这才缴足了题目的应有之意。从这个创作过程来看，“前”和“后”有联章之意，“后”是从“前”中衍生出来的，是对“前”的立意的演进和深化，是对“前”的未尽之意的补足和完成。如果援此为例，《前出塞》和《后出塞》的关系也应是这样的，“前”和“后”两组诗歌在内容上有紧密的关系，而不是简单标示两组诗歌的写作时间一前一后。

如果此说可从，那么这两组诗歌的写作年代亦可约略考之，得出与旧说不完全相同的结论。《后出塞》其五云：“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从“坐见”来看，这句应该是写实，而非逆料之词。从“河洛昏”一句来看，当时安禄山已经攻陷河北、河南及东都一带。而潼关尚未失陷，关中、长安犹在唐军手中。等到长安沦陷，天子出巡，国难深重已极，可谓“国破山河在”，老杜笔下措辞必然不会仅仅言及“河洛昏”而已。也就是说，《后出塞》极有可能作于安禄山攻占河洛，但尚未攻破潼关之时，即天宝十五载五月之前。当时，河洛已经被叛军占领，但唐王朝对战局还没有完全失去控制力，与安禄山的对阵还是局部战争，朝廷依然具备平叛的信心，甚至还有“禄山狂悖，不日授首”，“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的速胜论甚嚣尘上，讨论人心之

顺逆,也是当时战争局势下的热门话题。^⑧这恰恰就是杜甫所言“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问道归,故里但空村”的背景,也是他创作《后出塞》的背景。仇注将此作系于天宝十四载冬,似有略早之嫌,因为当时安禄山尚未占领河南一带。钱注和朱注沿袭前人成说,认为《后出塞》写在秦州时期,看到了“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所传达的战局信息,但他们可能认为这种情形更符合乾元二年史思明南下渡河进攻河洛的局势,当时杜甫已经迁居秦州了。但从杜甫的诗歌创作来看,他西行之后,仕途失意,有意疏离朝局,所作诗歌婉讽朝局者有之,而直接切及政事的作品较少,将《后出塞》系于秦州时期,似与当时诸作表现的心态不符。

那么,《前出塞》的写作略早于《后出塞》,但仍在天宝十四载冬与十五载夏之间。《前出塞》其九云:“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这是非常突兀的一笔。关于这句诗的理解,也有不少异说。唐王朝自开国到安禄山起兵,边塞战争已然司空见惯,“中原有斗争”在百余年来实不多见,从杜甫后来所作《忆昔》诗中可知,他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中原社会是非常富庶祥和的,他之所以突然从边塞战争的话头联想到“中原有斗争”?只能说明当时“中原有斗争”已经成为事实。前人也曾质问:既然中原已经发生战争,以杜甫之忠义,怎么能对此仅仅一笔带过,而不作深刻的讨伐?这不难解释,因为当时中原的战斗和西域军人的关系是正向的,恰恰是来自西域的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名将承担了抗击安禄山的重任,所以对那些从军西域的士卒来说,具有警示意义的是如何对待功名,而不是如何防范其叛乱。

总之,《前出塞》和《后出塞》叙述的都是“出塞”故事,探讨的都是“出塞”的正当性问题,但《前出塞》的主题仅仅涉及了列国自有疆和军中苦乐等问题,而没有深论穷兵黩武最终导致叛乱等更加严重的军事隐患,这正是《前出塞》的不足之处,也正是《后出塞》要进一步补足、演绎和深化的地方,“前”与“后”的呼应性就在于此。从创作时间上看,这两组诗歌大抵作于安禄山反叛到关中失陷之前,《前出塞》略

早于《后出塞》。两组诗歌都因中原叛乱的爆发,而引起作者对开元末期及天宝以来出塞的军事活动的历史性追忆和反思,《前出塞》其九有“从军十年余”之句,则其着眼在天宝初年以来,《后出塞》其五有“跃马二十年”之句,则其着眼上溯到开元二十五年以来,前者结合历史教训提出问题,后者切近现实危机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追溯的时限也向上延伸,历史意识更加深沉,这就使杜甫把对边塞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亲历者的视角与“出塞”心路历程的叙述

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虽然采取了组诗的结构,讲述了不同人物的故事,但他做到了首尾贯穿,断续相生,转接开合,能浅能深,这就在根本上尽量保全了乐府诗的叙事本色,前代诗话和评点对此有充分的肯定。作品由“从军者”的角色切入,通过当事人真切的从军经历,叙述了辞家、练卒、行军、出塞、作战、立功、反思等全过程,尤其侧重表现当事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苦闷,以及他对出塞、战争的思考和人生态度的转变,读者由此可以窥见唐代军中的生态和普通军卒的精神史。《唐宋诗醇》在评价《前出塞》时说:“九首皆代从军者之词,指事深切,以沉郁写其哀怨,有亲履行间所不能自道者。”^⑨《杜诗镜铨》说这些作品“诸诗皆代为从征者之言”,“深悉人情”。^⑩正是这个“代言”的视角,让诗人体察到了士卒的情感世界,并以温情之笔叙写他们的苦乐。

每一组诗都叙述了一个完整的出塞故事。《前出塞》其一“叙初发时辞别室家之情”。^⑪古代诗人在表现征人思妇的离别相思时,通常从“别后”切入,杜甫似更感兴趣“离别”的现场,他的《兵车行》《新安吏》都是如此。诗人对“辞别”的表现,着重凸显从军者内心的矛盾和沉重负担,这就准确抓住了从军者内心的真实状态。离家的时候,痛苦充满了他的胸膛,他并不理解此行的意义,他只是为自己和家人的不幸吞声叹息。第二首诗沿着初入行伍的体验来写“练卒”,表现他对军营生活的适应过程。这位从军者在家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必然从未亲近刀兵骑

射,如今经过严酷的训练,已然能飞身控马,挥戈驰骤。他的精神面目和情绪的基调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具有行动能力和冲击力的战士。《唐诗品汇》引刘辰翁云:“如亲历甘苦,极征行孤往之意。人所不能自道。”^⑩其三进一步挖掘他内心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中宣传的功名理想,慢慢潜入了他的内心并激励着他,“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王嗣爽云:“后四句发前未尽之意,作意外之想以自宽,正见其心绪之错也。‘图麒麟’,岂易言哉!”^⑪这是军旅文化对从军者的精神武装,军旅恰恰是通过“功名”思想的灌输调动他的血性和勇气。《杜臆》调侃说“‘图麒麟’,岂易言哉!”正是看出了其中的问题。训练结束了,他成了一个合格的士卒,等待他的是远方的战场。于是,其四写远戍边城。“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此时,他已经能勉强地服从军旅的行动体系,不劳长官驱使,不再顾念六亲。“有身”二字值得玩味,用他的身体去保卫遥远的边塞,他对此有清醒的意识。有的读者从这里读出了勇气、忠义,有的读者从中读出了惨戚,这就是杜甫的深刻之处。普通人的情感人格被重新熔铸,成长为一名从军者,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的体验。

其五就写到了万里之外的戍边之地。这里是胡汉对峙的前线战场。“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初来乍到,他从事着军营里最低端的劳动,他原本是要到边塞建功立业、受赏封侯的,谁知现在沦为了“奴仆”。他开始意识到封侯的梦想不切实际。仇注引胡夏客注云:“封常清始为高仙芝僚,后代仙芝为节度使,同开边拓境。此亦起于奴仆者。”^⑫这个资料并不能说明奴仆有可能成为节度使,只能说明军中奴仆是最低贱的人物,他们和“树功勋”的距离遥不可及。其六全是议论,《唐诗品汇》引刘辰翁云:“此其自负经济者,军中常存此人。”^⑬《载酒园诗话又编》:“此军中自励之言。”^⑭认为这首诗所谈的军机,是从军者一段切身的感慨,深味边塞之艰苦及阵战之酷烈者,方能有此持重之论,非贪功冒进者可知,亦非纸上谈兵者可知。其中“用长”“用强”的话是实战中

的经验,“射马”“擒王”的话是取胜的要诀,这些话都是从军事层面发表的。黄生云:“前四语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正因为这四句是从军者的经验之谈,所以表现出谣谚的本色。

其七又进一步,写在极寒恶劣条件下行军、筑城,其八写一次激烈交锋和大捷,这就是征戍的主要任务。前者极力表现士卒与风雪严寒作斗争,后者表现士卒迎击单于,使其明王成擒。在漫长的征战和严酷的考验下,从军之人已经成长为一名战士,“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是一名战士最切实际的想法。末篇就此收束,归结到“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一句。钟惺云:“‘出门’激烈,至此却敦厚。‘出门’是士卒气象,至‘杀人亦有限’‘一胜何足论’‘众人贵苟得’等语,便是大将军气象矣。”他看到了九首诗歌中,从军者身份气度前后已判若两人,可谓慧眼独具。杜甫此诗实为千千万万无名普通士卒立传,他们本是良人,被迫从军远戍,军队的苦乐考验着他们,特殊的训练改变着他们,他们逐渐成为有经验的老兵,习惯了艰苦严寒,看惯了贪功冒赏的苟且行径,既不再向命运期望什么幸运,又不再为美好的幻想而心动。他们不是大人物,也不可能成就什么大功名,但强大的军队正是由一大批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士卒构成的,他们把君子固穷的气节和大丈夫的四海之志熔炼在一起,表现出了士卒出塞的坚定信念。

《后出塞》五首则另写一段从军事迹。如果说《前出塞》写的是被迫从军的伤心事,《后出塞》便调转笔墨,写的是主动投军的欢欣事。《载酒园诗话》云:“较《前出塞》首篇更觉意气激昂。味其语气,前篇似征调之兵,故其言悲;此似应募之兵,故其言雄。前篇‘走马脱鞚头,手中挑青丝’,贫态可掬;此却‘千金买鞍,百金装刀’,军容之盛如见。前篇‘弃绝父母,吞声负戈’,悲凉满眼;此则里戚相饯,极醴错陈,‘吴钩’一赠,尤助壮怀。妙在‘含笑看’三字,说得少年须眉欲动。”^⑮为何会产生这样一种变化,王嗣爽云:“召赴蓟门者,禄山也。势已盛而逆未露,且以重赏要士,故壮士喜功者,乐于从之。其装饰之

盛,钱送之勤,与《前出塞》大不同矣。”^②此种解说未必有据。其实,唐代继承北朝的尚武风气,游牧民族本身崇尚马上功名,入主中原之后此风并未完全衰歇。府兵制的实行将平时为农、战时从军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从军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种选择,甚至是其出人头的捷径。随着唐王朝建立,边防力量增强,初、盛唐国力不断提升,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游侠精神在中原一带也比较流行,盛唐不少诗人都对此有所浸染。从这个背景考虑,《前出塞》和《后出塞》写法有变,正说明唐代人的出塞的故事少不得有这两种版本,缺一不可。奇妙的是,前者写的是不愿从军者被迫从军,最终成了一名坚定的战士;后者写渴望从军者主动从军,最终却因不愿附逆而当了逃兵,其中都包含着一个剧烈的翻转,这个翻转就是士卒精神觉醒的结果。

《后出塞》首章高调开端,从“封侯”的理想说起,与《前出塞》隐隐呼应。全诗借用了少年游侠题材的彩头,“出塞”的乐府格调与崇尚立功的理想、受赏封侯的浪漫精神相结合。“千金装马鞭,百金装刀头”,用最昂贵的材料装饰从军者的形象和理想。当其应募辞别故土,不仅从军者本人兴奋鼓舞,其乡曲父老亲戚、少年朋辈也都欢欣鼓舞,或钱酒壮行,或赠以吴钩,可知这是此间一种社会风气和群体精神,故当其身披戎装、跨马执戈之际,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围观者也分享了他的幸福和光彩。其二写他入伍后狂放的个性被军中气氛所洗礼。“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一联,把军中的严峻气氛写得精警壮阔。“落日”“风”是随处可见的平常意象,一旦与“马鸣”“大旗”相关联,气象迥然不同。日暮时分,新兵训练归来,各归营号,禁夜之后,一片寂静,绝无喧哗之声。《杜臆》:“前篇言唾手封侯,何等气魄,至此‘惨不骄’矣,束于军法故也。”^③同样,这也是新兵入伍之后,通过“练卒”的环节,他一改往日在家的面貌,受到军法军纪的约束。^④

其三则写赴边北伐,将士奋勇,旗开得胜;其四则写立功之后,主将受赏,居功而骄。行伍中的实际经历,让他逐渐对“功业”“封侯”的信念有了清醒的

反思。“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当初他本人就是在“功业”“封侯”的憧憬中投身行伍的,当他遇到了真实的战斗,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才认识到为了“高勋”而出塞,固然可以凭着义勇有所斩获,但是,士兵效命的结果是什么?一是天子得到了土地,开拓了疆域;二是主将得到了勋位。诗中的从军者来自民间社会,从他朴素的个人情怀和普通士兵的身份出发,他看到天子对土地的拓展和主将对位势的积累如果超越了有限的合理性就会向一个危险的方向转变,其四就集中笔墨揭示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恶化的动向。“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意识到这一层,从军之人开始从否定的角度看待“功业”“封侯”,这就是对自己当初思想境界的反省,也是对热衷军功的社会文化的警示。《载酒园诗话》:“首章言应募,次章言入幕,三章言立功,至此极言边城之富,而边将之横,始有失身之惧矣。”^⑤甚为有见。于是,他重新回归自己“良家子”的身份意识,“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由此对“出师”“将骄”“身贵”“主恩”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不同程度上给出了否定性的判断。由于对军事的失望,他选择了逃归。当年热心而往,如今灰心而归,对从军之事有了颠覆性的认识。这个转变是有力的,它来自从军者的实际经历,也来“良家子”的朴素意识。《载酒园诗话》:“此诗有首尾,有照应,有变换。如‘我本良家子’,正与首篇‘千金买鞍’等相应。‘身贵不足论’,与‘及壮当封侯’似相反,然以‘恐辜主恩’而念为之转,则意自不悖。‘故里但空村’,非复送行时‘拥道周’景象,此正见盛衰之感,还家者无以为怀,意实相应也。”^⑥用心很细。当了逃兵未必是耻辱,他的洞察力和清醒、坚决是令人敬佩的。

曹植的《白马篇》曾写一位少年英雄,练就精湛的骑射之术,后来长驱从军,视死如归的动人故事;王维《少年行》四首写少年游侠立功塞上、封侯受赏的动人故事。此外,盛唐时期不少边塞诗歌还写军中的苦乐、成功与失败、得意与失落、坚强和脆弱。

杜甫《后出塞》笔下的故事是“特殊”的，他细致地梳理了少年游侠英勇从军而又最终放弃英雄梦、功业梦和封侯梦的过程。既是对《前出塞》的一个补充，又是对古来多少出塞曲的翻转。

总之，《前出塞》和《后出塞》贯穿着同样的写作思路，诗人站在从军者的立场上，走进了从军者的内心世界，这是“乐府”的艺术特色所要求的，也是“乐府”诗歌的社会功能所提出的伦理责任，作者必须通过“乐府”传达民间社会的生命诉求，以及最底层社会为整个社会现状的维持和变革所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些不幸虽然属于个体，降临在个人或家庭的身上，但这个不幸的事件本身是社会力量造成的，而不是当事人自己的能力责任方面存在缺憾或道德方面存在过失而导致的。因此，乐府诗反映的人和事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一种社会矛盾的预警和对当权者政治责任的反省。乐府诗不是为温情而作，而是为时代性的担当而作。

三、“赴交河”与“备吐蕃”考辨

《前出塞》所隐括的从军战事有较为清晰的行动方向。前代注家认为这里涉及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吐蕃的。从九首诗歌的整体来看，此说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史诗互证的思路推求，这里的“出塞”很可能指向的是安西北庭一带。

诗人一开始对此行出塞的方位便有提示。诗其一云：“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黄鹤云：“西州交河郡，在唐陇右道，郡亦有交河县。自县三百七十里至北庭都护府城，备吐蕃之处也。”钱注云：“《元和郡县图志》：‘交河县，本汉车师前王庭地。贞观十四年，于此道置县。交河出县北天山。水分流于城下，因以为名，天山在县东北。’”^②这两个注释都用“交河县”解释诗中的“悠悠赴交河”。其实，唐陇右道西州，唐玄宗天宝元年，州名改郡，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又将郡名改回州名。西州的郡名是交河郡，若杜甫这组乐府诗作于天宝至德之间，则诗中所云“交河”，也可以理解为西域天山南之西州交河郡，当然这与交河作为县名、河名是不冲突的。从诗人使用地名的灵活性上看，“交河”可以泛指包括交河县在

内的西州及其周边区域。杜甫《高都护骢马行》诗云：“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腕促蹄高如踏铁，交河几蹴层冰裂。”^③赞颂安西都护的青骢马，高都护从安西归来时，青骢马曾经踏裂“交河”的冰面，可见在杜甫的意识中，交河是从安西东归时经过的一条河流，因此，“悠悠赴交河”的目的地应该也是指向安西一带。在《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一诗中，杜甫为出任河西节度使判官的同僚送行，写道：“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④此诗作于至德二载，时杜甫在凤翔。武威即凉州，是河西节度使所在地。盛唐时，自长安西行经凤翔至凉州，有专门道路通达，“经凤翔府及陇、秦、渭、临、兰五州，渡河至凉州”，^⑤“凡二千零二十里”。^⑥而从凉州继续西北行，经甘州、肃州、瓜州、沙洲、伊州、西州，而后继续西行至安西四镇。“此为长安通西域之大道。”^⑦据此可知，杜甫所送之长孙侍御赴任武威，必然由此大道长驱而往，故称之为“交河道”，并不是说武威在交河。

旧注以为“交河”所在地，为“备吐蕃之处也”。此说亦失之笼统。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对安西、北庭的军事部署有精辟分析：“安西节度使之职能为抚宁西域，即保证西域不为吐蕃所侵占也。北庭节度使的主要职能为防制突骑施联合吐蕃侵占西域北部也……开天期间，西亚之大食强大，东向发展与吐蕃联合，吐蕃又联合西域北部的突骑施；三个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联合侵犯大唐帝国，首先要侵占西域，继而侵犯河西。这一险恶形势迫使河西节度、安西节度、北庭节度必须在统一计划统一部署、统一指挥之下，勇敢拼搏，方能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西北军事格局之形成，军事形势使然也。”^⑧也就是说，从宏观的战略来分析，包括安西、北庭在内的整个西域的军事部署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方向上肩负预防吐蕃的军事任务，但这个“备吐蕃”只是战略性的。

《资治通鉴》云：“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陇右节度备御吐蕃……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

獠。”^⑧可知唐军“备吐蕃”的布局重心另有所在。严耕望云：“唐世，吐蕃强盛，取据青海西南吐谷浑故地，河、湟、洮水、青海间遂为唐蕃兵争之疆场。唐置陇右节度使镇鄯州（今乐都）；统军多至二十有余，兵额十有余万，屯田积谷，为常备之计。复左翼剑南，右翼河西、安西诸节度为犄角，自西北迄剑南，战线绵延逾万里，为大弧形以制之，而陇右、河、湟实为主战场，兵争之中心。盖此地区不但为大弧形阵线之中段，且有黄河及其支源槽谷贯穿其间，地势平坦，行军为易，不若河西、安西有昆仑、祁连之阻，剑南西疆有横断山脉之限也。”^⑨从地理位置和军事上看，交河所在的西州与吐蕃距离较远，且有大漠高山相阻，天宝中并无直接军事对抗，又非前线要冲，把远成交河的行动与“备吐蕃”直接联系起来，甚至将其强调为针对吐蕃的具体军事行动，是不大妥当的。

旧注强调《前出塞》的内容与“备吐蕃”有关，是为了将诗中所写的战事与哥舒翰联系起来，进而利用古史和杜诗中对哥舒翰的批评，进一步否定诗中所写的这次出塞战争。朱鹤龄注亦云：“玄宗季年，哥舒翰贪功于吐蕃，安禄山构祸于契丹，于是征调半天下，《前出塞》为哥舒翰。”^⑩钱谦益注《送高三十五书记》中也有同样的议论。“玄宗有事于西戎垂二十年，用哥舒翰于陇右，始克石堡。靡敝中国多矣。”^⑪这一段话虽然不是对《前出塞》而发，但对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西域战略及对吐蕃的相关战争给予的否定评价，尤其是对哥舒翰经略陇右的功效给予的否定评价，则是一贯的。旧注将《前出塞》所写“出塞”与哥舒翰“备吐蕃”联系起来，加强了杜甫不同作品之间的互见效应，也为这一解释提供了表面的内证和自证。这个阐释策略的效果是明显的，但与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当哥舒翰统御陇右之时，经过长期的军事活动，逐步迫使吐蕃的势力从渭州、瓜州向西南退却，湟水、青海、洮河一带成为军事对抗的核心区域，天宝后期为“备吐蕃”而推行的屯军、屯田举措，也都围绕这一区域展开。严耕望云：“鄯州南临湟水，为盛唐时代西疆军事交通之中心，开元二年，

置陇右节度使，以鄯州都督充使职，统军常约七至十，守捉镇戍若干，分布鄯、廓、河、洮诸州，以备吐蕃；并移临洮军于鄯州，统兵一万五千人以镇之。天宝末，哥舒翰收复黄河九曲地，分置两郡，倍增军戍，星罗密布，视他道为最密。”^⑫旧注把《前出塞》看作是对哥舒翰在陇右、河西等地防御吐蕃而征伐戍卒，又暗示读者哥舒翰一贯顺从玄宗开边黩武的冒险政策而猎取个人富贵，曾经以数万将士的性命为代价发动了“所得不如所失”的石堡城血战，进而把《前出塞》中的思考实实在在地落在哥舒翰“备吐蕃”，极可能是一个强制性的阐释，而忽视了杜甫实际上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杜甫诗中如果涉及陇右、青海区域与吐蕃的战争事迹，常用的带有地域特征的名词和意象，也与《前出塞》所写不同。

根据本文的考索，杜甫对“出塞”的理解并非像旧注所强调的那样，是指向哥舒翰与吐蕃的战事，而极可能指向安西、北庭的遥远地带。这也就是他所感慨的“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怨辞所针对的问题。从诗歌内容来看，其三云：“磨刀鸣咽水”用《陇头歌》典故，陇头与陇山有关，陇山即“天水大坂”，乃是关中西出陇山之所经，并非以陇西为目的地。其四云：“送徒亦有长，远戍亦有身。”说明此行出塞另有“远戍”之地，新募士卒在经历了必要的训练之后，在官长的带领下前往戍地。其五云：“迢迢万余里，领我赴三军。”这支士卒队伍出塞前往的戍地，乃在“万余里”之外，到了戍地之后，编入作战部队即“三军”体系之中。^⑬“万里”正与安西、北庭一带军事前线的距离相近。当然，“万里”是杜诗常用的里程数，一般情况极言距离之远，未必与实际相符。但考虑到《前出塞》是乐府诗，而乐府诗的写实性是杜甫创作的重要着力点，这与其他诗歌题材是有差异的。正因为出塞的目的地如此复远，士卒在初离家时尚留恋亲戚，当其“远戍”之时，便有“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的决绝之语。到达“万里”之外的戍地，与敌军近在咫尺，“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的情景便是北庭、安西一带的实感。“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迢危抱寒石，指落层冰间”，亦与西域天山

一带风雪严寒、跋山涉险的情况更为相契。谢思炜说：“西北高山无逾葱岭，而玄宗时远征逾险则无过高仙芝讨小勃律之役。”^⑩此说甚为可喜，但不必坐实为高仙芝翻越葱岭远征之役。“已与汉月远，何时筑城还”一句的旧注云：“天宝中，哥舒翰屡筑军城，备吐蕃。”实则筑城是构建有效防御工事的常用手段，不限于河西一处。“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正因为戍地远在西北，故对浮云南征而兴叹。“单于寇我垒……虏其名王归”云云，皆用匈奴名号，与北方南下之敌相契合，而用“单于”来称谓吐蕃首领甚为少见。注家有以“天宝十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执突骑施可汗及石国王，此皆所谓虏其名王也”^⑪解说此句，虽说只是聊举一例，实则不无会意之处。

然而，西域是一个遥远的世界。从杜甫一生行踪来看，他没有出塞的经历，写“出塞”的经历，他缺乏切身的体验和第一手的见闻，西域的山川地理、风物气候，他只能写其大概。《杜诗言志》云：“先生未尝从军，而将那塞外之事，写来历历如画，又将那从军的壮士好处苦处，曲曲写出，是又具大知识，无微不至。吾尝读《毛诗》周公所作《东山》三章，以劳军士，亦是这般一色写出，乃知少陵之所原本者深矣。”^⑫作者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但他给出的答案是无力的。对唐人来说，西域是遥远而奇幻的世界，是边塞军旅的激情和殊方异物的奇妙体验相融合的地方，西域想象和西域书写在当时是备受关注的热门题材，但杜甫对此无法做到长袖善舞。他只能凭借自己仅有的关于西域的地理知识和深邃的现实思考赋予作品以特色。

杜甫和岑参的交往，很可能对于他的《前出塞》创作带来了有益的启发。天宝八载冬，岑参赴安西高仙芝幕府，路途所经，咸阳、陇山、渭州、燕支山、酒泉、阳关、蒲昌、火山、西州、银山碛、铁门关，天宝十载，沿原路归长安，往返皆有诗歌纪行，同时抒发其离乡去国的愁思。《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回顾自己的安西之行，“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

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地上多骷髅，皆是古战场”^⑬，皆是自己道路亲历、耳目见闻的实际印象。天宝十三载，岑参再赴北庭，途经陇山、临洮，金城、武威、贺延碛到北庭，有一系列表现北庭风物和特殊气候的诗篇。岑参的两次西域之行，不仅让他对西域的风物气候有了直接的感受，而且让他深刻体验了出塞远戍、思念亲故的情感痛苦。他第一次远赴西域时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情绪压抑苦闷，第二次远赴西域时入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府，他情绪极其激昂，写了一系列战斗之歌和胜利之歌，这两次出塞的情绪变化反映了出塞人的两个面孔，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而这种情绪之间的变奏，正好也是杜甫《前出塞》的两个旋律。

杜甫与岑参交好，过往甚密。尤其是天宝十载岑参首次出塞归来，与杜甫有频繁交往。天宝十一载秋，杜甫与岑参、高适、薛据、储光羲等登大雁塔赋诗；天宝十三载，杜甫受岑参之邀，与岑参兄弟畅游浞陂湖并作有《浞陂行》，杜甫又有《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浞陂》，岑参亦有《与鄠县源少府泛浞陂得人字》，可知杜甫与岑参同在此次宴席，诗酒唱和。杜甫另有《九日寄岑参》，也是天宝十三载前后所作，诗中有云：“出门复入门，雨脚但如旧。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⑭可见两人交谊之厚，诗结尾云：“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杜甫对岑参的诗歌十分赞赏，两人的诗缘是其交谊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岑参刚从安西归来，杜甫或读到了岑参的西域之作，故有“岑生多新诗”的评语。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岑参的西域之作是他赢得身前身后之名的代表作，杜甫也是他的读者之一，这些作品对杜甫的“西域想象”和“西域书写”自有不可否认的影响。根据前文考证，杜甫创作这两组出塞之作时，岑参二次出塞西域尚未归来，所以杜甫对出塞西域的想象和岑参首次西域之行的精神体验是一致的，而与岑参二次西域之行的情绪变化稍有距离。直到至德二载，岑参第二次西域之行归来，与杜甫在凤翔行在相遇，杜甫曾举荐岑参担

任右补阙,乾元初在京城同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彼此又互有唱和。

总之,出塞是一种特定的军事行动,是向着一个真实的空间展开的,这个空间在政治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和紧张感。为了强化出塞的写实性,杜甫就要捕捉真实的空间元素,来凸显出塞的地理感受。他在创作《前出塞》的时候,其中的故事是以安西北庭为指向铺展开来的,而对杜甫来说,“出塞”的体验与西域想象成了写作中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杜甫有机会读到岑参首次西域之行的重要作品,他对岑参的文学才能是极为赞许的。岑参诗歌是全面展示西域的社会文化、地理风光的杰出代表,尤其是通过诗歌深入、全面叙述西域的从军故事,直接反映出塞人的精神史,岑参的作品也无疑是最为深刻的。这些内容与杜甫《前出塞》构成了呼应和互动,也折射出他们二人的文字因缘。

四、余论

杜甫的《前出塞》和《后出塞》在杜诗中是有特别之处的。这两组诗不仅在内容方面涉及军事、边塞等特殊题材,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对乐府体裁作了深入探索。杜甫根据自己的认识,抓住了乐府的根本,那就是乐府诗应该站在小人物、底层人物的角度上,从他们卑微的身份进入,用他们朴素的情怀、有限的见识来面对、认识自己所遭遇的现实矛盾,并对现实矛盾的真相给出直接的判断。

如果说杜甫对乐府的这种认识,在《前出塞》和《后出塞》的创作中表现得还不够集中和突出,那是因为他对“出塞”“从军”“西域”和“蓟北”等重要因素还有些隔膜,他又过分追求这两组诗歌在表面上对唐代“出塞”和边塞军事问题的涵盖力,所以对主要人物、主要事迹、主要矛盾的表现还有些泛化,其中的人和事比较模糊,针对的社会矛盾也比较表面化,作者本人的创作思路还有进一步澄清和深化的空间。但是,当杜甫创作“三吏”“三别”的时候,就完全克服这些不足,摆脱了这些困扰。最关键的突破是,他抓住偶然所见的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内涵。同时,作者深深地潜入到作品中的人

物身上,以简略的笔法和浅近的语言,讲述那些战乱重灾区的底层百姓,如何承受家破人亡的痛苦,及其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哭泣之后,又如何从布满疮痍的身心中焕发出靖难的力量和平乱的勇气。杜甫为那些走向战场的老人和少年、新婚的夫妻写作,他虽然在诗中把自己定位在旁观者、目击者、知情者的角色中,但他的心已经和这些卑微的苦命的人联通在一起,这些人是乐府诗歌真正的主人。作者的叙述手法看上去完全是随意的、朴素的,实际上小心翼翼,因为那些无名的、卑微的、受苦的人残存的生命,就在作者的字里行间喘息。

注释:

①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页。

②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页。

③唐元玆语,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649页。

④梁运昌语,见《杜甫全集校注》,第259页。

⑤朱鹤龄辑注,韩成武、孙微、周金标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⑥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杜工部诗集辑注》,第12页。

⑦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⑧《杜甫全集校注》,第650页。

⑨杜甫著,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1页。

⑩⑪《杜诗详注》,第118、1848页。

⑫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35~6942页。

⑬莫砺锋主编,童强标点:《御选唐宋诗醇·杜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2页。

⑭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⑮《杜诗详注》,第118页。

⑯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

⑰王嗣奭:《杜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00页。

- ⑬《杜诗详注》，第122页。
 ⑭《唐诗品汇》，第111页。
 ⑮贺裳：《载酒园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20页。
 ⑯《载酒园诗话》，《清诗话续编》，第320页。
 ⑰《杜臆》，第102页。
 ⑱《杜诗详注》，第287页。
 ⑲末二句由此推测其主将可能是霍去病这样的人物，古代评论者以为此句是反语，流露出杜甫对军中将领的不以为然之意。这种见解恐不可信。
 ⑳《载酒园诗话》，《清诗话续编》，第321页。
 ㉑《载酒园诗话》，《清诗话续编》，第322页。
 ㉒《钱注杜诗》，第93页。
 ㉓⑳《杜诗详注》，第86、362页。
 ㉔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16页。
 ㉕⑳《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第418、426页。
 ㉖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3年，第169页。

- ㉗《资治通鉴》，第6849页。
 ㉘⑳《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第497、570页。
 ㉙《杜工部诗集辑注》，第214页。
 ㉚《钱注杜诗》，第3页。
 ㉛从路程距离来看，陇右节度使所在鄯州，距离长安一千九百六十里。河西节度使所在凉州，据长安两千里。相比之下，诗中所云“迢迢万余里”虽是概数，但也与哥舒翰所在区域相差甚远，似与安西、北庭的道里相关性更大。可参严耕望撰《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
 ㉜《杜甫集校注》，第457页。
 ㉝《杜甫全集校注》，第253页。
 ㉞佚名：《杜诗言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㉟岑参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陈铁民修订：《岑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㊱《杜诗详注》，第208页。

Realism and Imagination: Annotations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Du Fu's *Beyond the*

Frontiers, First Series and Beyond the Frontiers, Second Series

Li Jun

Abstract: Du Fu's *Beyond the Frontiers, First Series* and *Beyond the Frontiers, Second Series* were both created before the period from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to the occupation of central Shaanxi. Their time of creation is close. The sudden warfare of the rebellion caused Du Fu to reflect on such issues as leaving home to garrison the frontiers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poems, Du Fu forsook his identity of a scholar-official and consciously depicted the experience of marching out to the frontier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ldier, and he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for going to war on the frontiers. In addition, he soberly examined the popular and conventional concept of scoring achievements and winning rewards, and directly judged the truth of war. All this embodies Du Fu'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yue-fu poetry. Previous annotations which believe that *Beyond the Frontiers, First Series* were created for Ge Shuhan who defeated the Tibetan regime are disputable. If we verify between poem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we may find that the frontiers meant by Du Fu refer to the Anxi-Beiting region with Xizhou as its center. Du Fu himself had never marched to garris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His friend Censhen's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poems he created were useful guidance for him to grasp the artistic tension between realism and imagination.

Key words: realism; imagination; the Western Regions; yue-fu